目　录

李济深的略历……李济深口述　张克明笔录（1）
附录：李济深诗选……（31）
关于李济深扶植新桂系起家的片断回忆……李洁之（33）
我所知道的李济深……张　崴（44）
关于李济深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革命活动……李镇靖（53）

广西地下工作的回忆……粟　稔（66）
回忆粟稔……冯媛修（70）
回忆桂林救亡日报片断……谢加因（77）
回忆桂北武装斗争……阳雄飞（81）
桂东南兴业武装起义史略……陈业怀（111）
抗战期间党在北流的妇女工作……陈维拉（122）

夏荣新事略……韦瑞霖辑（129）
龙潭战役片断回忆……张文鸿（140）
北伐前白崇禧在桂林的活动……李任仁（149）
刘日福与新桂系……邓维庄（15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桂绥宜山指挥所“策剿”都宜沂游击队
经过……莫树杰（161）
大瑶山群匪败灭前后……罗绍章（169）
湖南解放前夕白崇禧的垂死挣扎……苏本善（174）

关于省立桂林师范的片断回忆……唐现之（180）
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经过……刘　介（188）

中渡、融县、百寿三县民变事件……黄炳钿等（207）

✓广西基督浸信会传教史……（222）
梧州火柴厂简史……钟杰生(238)
贺县、富川、钟山三县矿产开掘概况……罗伟钧（244）
校对与补漏……李汉泉（251）

转载 李济深先生莅玉经过纪要……（255）

李济深的略历

李济深 口述

张克明笔录

（一）少年时代及参加辛亥革命

我于一八八六年诞生于“亦耕亦读”的富农家庭中，根据家谱所载，我的先代是江苏人。大约从明朝迁到广西，以后做官到梧州，就在梧州附近的思化洲落业。在梧州落业后，后代有部分人搬到岑溪县去了，有部分搬到苍梧县冠盖乡。分到我祖父一派的先代，从所住的地方估计（住在村的南头山边比较隘的地方。）看来已经是雇农了。以后慢慢有了田地，才由雇农变成中农、富农的。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都教书为业，甚有贤名。我年幼的时候，读书之外，亦参加过耕田、上山放牧的劳动。我有五兄弟，二姊妹，大兄夭折，实际只有四兄弟二姊妹。我的父亲是读书人，为人正直，颇得人心，远近争相延聘教学，对我们兄弟管教得很好，故我们兄弟后来都不致于堕落。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幼时，曾随父亲到离家二十里的地方名马王村教馆处读书。父亲去世后，我又随叔父读书。到十二、三岁时，进大馆，乡下请有功名（入过学的老师教书的名曰大馆）读了几年，到十六岁，开始学作八股文，开始学作起讲。（八股文的作法中的名称）那时清朝已经维新变法了，废八股，改

策论。因此，我族中有一位兄弟，也是榜上有过名的人，教我作策论。那时，废八股，兴学堂，梧州设有一间中西学堂，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与外国教会有关系的，所以都非常排挤和厌恶学堂，入学堂的人名之曰入教仔。我的岳母就很不满意我在这间学堂读书。我曾考过一次试，是在学堂送考的，未考取，从此科举就废了。

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里的庄蕴宽是个知府，庄蕴宽先在广东做过武备学堂总办，他那时到梧州任知府，中西学堂就是他办的。当时清朝要兴办新军，在两广地方开办一个陆军中学，主持选送学生入军校读书，选了十名，我是选生之一。因此，十八岁那年，我就去广东黄埔读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读了两年，还没有毕业，因为照当时陆军部的新规定全国只设四间陆军中学，两广没有规定办陆军中学，陆军部把两广陆军中学取消了，将我们一班学生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就是将武备学堂改办的。于是我就转入陆军速成学堂。陈铭枢和蒋光鼐也都在陆军小学读书。那时因为要练新军，成立一个模范营，是准备训练军士干部的。我在速成学堂毕业后，在该营当见习官。后该营改称学兵营，我当学兵营排长，邓铿当连长，我与邓铿就是这时认识的。当见习官不到一年，我又入讲武学堂，继续读了一年。那时，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陆大，要各省选人去深造，要在学校毕业做了军官两年才有资格被选送，我正合条件，于是我和张文、张国元、伍观淇、刘光、胡承祜等十名被选送，考取了八名，是广东选去的。在陆大读了两年，就辛亥革命了。我虽未参加同盟会，但暗中参加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中职教员学生拟在保定附近浏河地方将铁路桥破坏，以阻碍清朝运兵南下，那时广东已经光复，同学组织北伐军，

姚雨平作广东北伐军总司令。我和张文到上海会到姚雨平，我就参加到北伐军做参谋工作。因为我是在陆大学高等军事学的，很得姚雨平的器重，我随军转战到固镇南缩州，进军徐州，前军已到山东韩庄一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黎元洪做副总统，通电解甲销兵，大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都有解甲归田的想法，于是把北伐军四军改编缩为一个旅，送回广东，编成一个师。原来广东北伐军编为第四军共两师，一师在前方，一师尚在广东，在前方的编为第四军二十二师我做二十二师参谋长。到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陆大移北京开学，我重返陆大再读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官，教了五年书，所以陆大出身的许多大官，如徐永昌、郭松龄、黄旭初等都是我的学生。

（二）参加护法之役的北伐

我在陆大服务时期，每年都想回南方省亲一次，但因会晕船，往返很苦。一九二〇年我又南回省亲，想不到我这一次南返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陈炯明已回粤，邓铿见了我，坚留我在第一师服务，于是我就留在广东了。始初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三个月以后，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调到元帅府作警卫团长工作去了，就由我任参谋长。邓铿那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他很信仰孙中山先生，非常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主张，但他又是陈炯明的参谋长，陈炯明是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伐的。邓铿常常在叹气，并曾将他十分难处的情形告诉我。那时孙中山先生筹备北伐亲到广西去，要李烈钧从广西出师北伐，邓铿暗中在帮助饷械。陈炯明兄弟忌之，因此把邓铿暗杀了。中山先生得到消息大怒，改道由广东出师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伐，免去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中山先生到广州，对第一师官兵讲话，一师内部本来是很复杂的，结果被中山先生说服了，同意出师北伐。

我们打到赣州，正在准备攻打南昌，胡汉民跑到赣州来了，原来是陈炯明勾结了吴佩孚，于六月十六日，令叶举指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胡汉民要求粤军、滇军返粤靖难。粤军以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但政治基础不稳固，其中陈炯明部下人手很多。第一师师长是梁鸿楷，我是参谋长。梁是学兵营出身，作战很勇敢，但是没有政治见解，一个可东可西的人。第一师有四个团：第一团长谢毅，该团是梁鸿楷的底子；第二团长徐汉臣，该团是陈炯明旧部；第三团长陈修爵是学兵出身，人很勇敢。该团亦是听信陈炯明话的；第四团长陈铭枢，该团是学生军，是模范团，较有革命意识。另外有个工兵营营长是邓演达，亦有革命认识，第一师内部如此复杂，要打回广东去，无甚把握，因四分之三是陈炯明的力量，只有四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的力量可靠。说要继续北伐，兵士又不肯，怕造成兵变，只好听胡汉民的要求回粤靖难。为了壮声势，我拟了一封电报给陈炯明，数他炮轰观音山的罪状，骂了他和叶举一顿，并说明我们北伐本来可以到达长江，现在事既至此，我们要从东江回广东，搞好广东安定后方再行北伐。打这封电报的用意，是可以威胁陈炯明，他一定要派兵到惠州来阻挡。许崇智、朱培德等则带兵从韶关回粤，在南雄与陈炯明部队打了起来。我们第一师到了老隆，陈修爵团被陈炯明调去打许崇智去了。第一第二两团亦被陈炯明调走了，只剩下陈铭枢一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到了河源，陈炯明派人来劝陈铭枢，陈铭枢亦被运动走了，以后邓演达亦跟着走了。事既如此，我非常愤慨，辞职返广

州，路经惠州，找陈炯明讲话，他一见我脸色都变了，我未说话他就连说“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是叶举干的。”

（三）重整第一师

我回到广州，中山先生在中山舰上，叶举军队在白云山脚，因为许崇智在韶关方面失败了，中山先生只得出走香港，后来又去上海。这时陈炯明重返广州，他们因为打胜仗，好象很得势的样子，天天在八旗会馆打麻将，叫娼妓，无法无天，我看不顺眼，情绪消极。中山先生在上海向陈可钰问起第一师的情况，觉得第一师还有相当作用，因此，叫陈可钰回广州来，叫我千万不要离开第一师，千万不要消极。当时我觉得陈铭枢都变了，第一师那里还有可为！心里着实很不痛快。但结果，我还是再返第一师当参谋长去。陈铭枢以后回来了，陈炯明对他很好，陈铭枢心中惭愧，就辞了团长职务，改名真如，到南京学佛去了，他那一团人交给陈济棠指挥。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叫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由闽攻潮汕，以滇桂军取道梧州入粤攻陈炯明。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滇军到广西与桂军会合。当时粤军据守梧州，以熊略一旅为主力，以后又调第一师来协助。我知道滇桂军是奉中山先生之命来的，我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中山先生叫我埋伏。在第一师，原来就是要我在必要时为内应的。

这时第一师的人马又多起来了。张发奎随许崇智在韶关被陈炯明军战败后，入山为“匪”，后来带了人来投降第一师，任营长职务。陈修爵亦收到一团人来第一师，有中山县人卓

仁机亦来归第一师，陈济棠、邓演达亦在第一师，我们又掌握了第一师了。第一师当时任务就是在后方做内应工作。当时陈炯明以叶举为总司令，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叶举见第一师布防在肇庆一带，有点心慌，约我们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席间，邓演达毫不犹疑，举起鸡血酒一饮而尽。等到叶举一出门，就放枪，张发奎、陈济棠、卓仁机等发动兵变，滇桂军合力进攻，占肇庆、三水，夹击广州，陈炯明遂收军退回惠州。

许崇智与杨希闵、刘震寰不睦，杨、刘两人将胡汉民、魏邦平拘捕了。魏邦平有第三师，力量不大，连我们第一师，以魏邦平为总司令。第一师本来每日二百元，平均每人一毫钱的伙食，魏邦平被捕后，饷无处领，变成无政府状态，不免照当时坏习例，开赌筹饷。张发奎说，这回对不起广东，我们竟引狼入室了。我们的力量是邓演达、陈济棠两个旅，张发奎一百多人，总起来不够两千人。我们没有了主脑，北方又被占了。又无伙食，便设法逃出滇桂军的势力范围，因为滇桂军很野蛮，随时会缴人枪的。所以趁滇桂军还未达到新会江门，我就决定带第一师偷渡黄埔到江门去。

江门原有一个善后处，处长陈德春，是陈炯明派去当处长的。那里的军队是粤军，士兵出发去了，只有司令部，有三百兵左右。我们一到江门，找商会长来，叫他筹饷。不久，我们把陈德春的枪缴了，占了善后处。在江门大约住了半年，因为粮饷问题解决了，就积极整顿内部，训练军队，以后又占了台山，又征了一些新兵。

（四）为统一广东而征战

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山先生返广州，设大本营。中山先

生未返前，是胡汉民代帅。大本营设有驻西江办事处，我是办事处长。大本营也是没有经费的，财政部长古勒勤还要我们筹饷支持大本营。第一师的势力以后向西江发展到肇庆，沈鸿英部下有一旅人在肇庆。时沈鸿英已有动作，大本营要解决他，我带兵去围肇庆城，工兵营长邓演达、陈济棠、张发奎、都一齐去，围城攻打不下，由工兵营挖城埋药，爆破十余丈缺口便冲进城去。沈部逃跑的不多，都缴了械。我们溯江而上，占了西江。梁鸿楷升为第一军长，我升为第一师长兼军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我们在西江时，办了一个讲武堂，戴戟为堂长。黄琪翔、钱大钧等都来讲武堂训练军队，中山先生返广州后，一切经费大都靠西江收入来支持的，他想办黄埔军校，叫我和廖仲凯筹备，那时，蒋介石从上海跑来看我，并参观讲武堂，我找一些干部去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严重（邓的团附，人很好）。林伯渠、钱大钧、陈诚等都在那里工作。我因为在西江也要练兵，不能做校长，只做副校长，兼训练处主任，副主任是邓演达。

中山先生在广州很受气，刘震寰、杨希闵等占了广州，天天开赌，不听命令，商团事变时，滇桂军还包庇陈廉伯，我主张立即缴商团的械，请中山先生下命令给我去负责。商团事变解决后刘、杨还是很跋扈。我带了一两团兵（其中有黄埔学生。北江调来的湘军和我西江带来的兵）在小北江绕过粤汉路南下来攻广州，才把刘、杨的滇军解决了。广州统一了，然后大本营才有点权力，设大元帅府，胡汉民为秘书长，廖仲凯为财政部长，革命政府才象点样子。

但是大元帅府的权力仅在广州和四邑，广东的东江，南路仍未得手。我那时又奉命去打梧州沈鸿英的部下。黄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竑、白崇禧倾向我们，派陈雄到广州见廖仲凯，又来西江见我，跟我一起出发，愿为内应，梧州守军旅长陆某投降。我被派兼梧州善后督办，黄绍竑为西江总指挥，我派徐景唐、陈济棠等帮白崇禧打八步，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军队，统一了广西。这完全是第一师帮他们打统一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在广州，当时革命力量还仅及广州及附近各县。北江却解决了，南路是邓本殷、吕春荣的势力，东江是陈炯明的老巢，第一次东征我只派了陈铭枢一旅去参加，收复了惠州，第二次东征是带陈济棠、张发奎去的。

国民党改组时，右派的人很不同意，如胡汉民、许崇智等，因此孙中山先生死后不久，我在西江得到急报，知道廖仲凯先生被人暗杀了。因为廖案，把胡汉民、许崇智赶走了。我回广州，把许崇智的兵缴了械。扣留梁鸿楷等，我接其军长职位。

广东国民政府将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共编为七个军，我原在第六军，许崇智走后，我调任第四军，这时是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二次东征时，第一路打海陆丰，我打第二路，从惠州直趋潮汕，程潜是第三路，从老隆到五华。时陈炯明在潮汕，林虎在兴梅一带，林虎想断我后路，派兵由紫金南下，我得到情报，中途转兵北上与林虎兵遭遇于热汤圩，打得非常激烈，我们把林虎主力击溃了，因为在山地隘路大军退却不易，主力就被我们歼灭了，进兵到紫金，蒋介石由另路冒险猛进，遇敌反攻，行李尽失，狼狈不堪，终由我派兵救援将敌击溃，来会紫金。

在第二次东征前，我派陈铭枢去打南路，但是失败了，

陈铭枢与朱培德从阳江败退到四邑。我被任命为南路总指挥，带张发奎的兵并指挥陈铭枢。我们另外又叫广西方面向钦廉方面策应，广西亦派兵帮助。时张发奎为副师长，黄琪翔为团长，都很勇敢，我们士气旺盛，一直打到阳江、雷州、琼州。钦廉方面由陈铭枢整顿，张发奎入琼州。在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仍在琼州。因为我在广东的东江，西江、南路方面以及广西方面都很有战功，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我返到广州时，国民政府开了一个盛大欢迎会，苏联代表团还送了我许多纪念品。

（五）北伐前后

当时，苏联送了许多枪来，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想给大家分一分，但是蒋介石想将苏联的枪自己独得。我本来收编了许多队伍，照实力可以编六个师，后来只编陈铭枢、张发奎、徐景唐、陈济棠四个师。蒋介石独裁气氛渐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共相争。他兼当广州警备司令，突然发生三月二十事变，将各机关监视起来，连俄国顾问在内。我当时任参谋部长，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跑去黄埔问邓演达（他是教育部长），他也不知道。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当时以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第二天汪精卫就潜逃了。蒋介石躲在广州市小北钱局碉堡处，怕人打他。我去找蒋，蒋问我事既如此，应如何处理，我说只有向政府及党自请处分，他答应可以。谁知陈独秀却决定与蒋介石妥协，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国民党组织部、工会、不能由中共人员负

责，其他什么会，中共亦不能参加，我极力反对无效，因为他与陈独秀已经暗中商量妥协定了。汪精卫走了，要推人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我何限不限于在广州的人，他们说不限，结果我仍举汪精卫、毛泽东亦举汪精卫，其他一概举蒋介石。这样，大权就落在蒋介石手中去了。

北伐时，蒋介石领第一军，谭延闿领第二军，朱培德领第三军，我领第四军，李福林领第五军，（那是李福林从福建回来赶走胡汉民后，许崇智的军队跑到海丰被收编的，第五军只有名目，实在是在后方保护兵站）。程潜第六军实力约一师人左右，第七军是广西的李宗仁，第八军是唐生智，唐生智与陈铭枢同学，唐生智派代表到广州来要求加入革命军。这些军队中以我第四军，力量最大。内有第十师陈铭枢。十一师陈济棠，十二师张发奎，十三师徐景唐，独立团叶挺。

在这几个军的政治部里面，都有中共参加。在军队里，也有中共党员。我军里的叶挺，就是一个很出色的党员。

我是北伐军总参谋长，不能出发前方，留守大本营，在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我因为留守关系，由陈可钰副军长带两个师即陈铭枢和张发奎，及独立团叶挺北伐。北伐军很拚命，一出湖南，垂手而得，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军，直指武昌，第四军威名显赫，有铁军之称。邓演达为围攻武昌城的司令，陷武昌后，带回许多胜利品给我。

蒋介石自己带军队自福建入江西。这时孙传芳加入吴佩孚方面，第四军因又转入江西打孙传芳。蒋介石的军队是最无战斗力的，他带王伯龄并指挥程潜军队打南昌，被敌反攻失败，王伯龄因此被撤师长职，后来白崇禧带兵赶到，助一臂力，才占领了江西，收编了很多军队。后白崇禧被任命为

十四路军总指挥，收复了上海、南京。

蒋介石到了南昌不肯去武汉，蒋介石自派各省省长、军队长官，完全无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想将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但是在武汉的军队是唐生智和第四军的军队，不是蒋介石的军队，不肯将国民政府迁去南昌。邓演达有一篇文章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应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指挥。因此就造成了以后宁汉分裂的局面。

（六）国共分裂

宁汉分裂后，蒋介石要我从上海到南京去，这时，汪精卫已经返国，在上海与陈独秀发表一篇声明，就去了武汉，武汉政府免了蒋介石一切职务，蒋介石在上海束手无策。在一次会议上，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孑民及几个监察委员提义清党。当时我是广东省主席，黄绍竑是广西省主席，蒋介石没有力量，现在提议清党，使我一头雾水。不过我当时在广州已经感觉有些分裂的迹象。第三国际派一位印度人名鲁易的来和我谈，我看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方法怕有点不妥当，会失败，那些政治顾问的做法与中国人性格不同，用手法，不用说理、说服方法，而用策略不讲信实。虽与国民党合作，但其方法，用策略，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空气不和协，卒之分裂。

蒋介石因白崇禧军队收复了上海南京后就到了上海，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上海去商量局势。其实蒋介石在当时是束手无策的，要我到上海去，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受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张静江等的怂容，赞成了清党主张，及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造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应负担很大

的反革命的责任。因为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

国共分裂时，我在广东，清党时，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名义，命令各个军队清除中共，两广亦开始清党，这时武汉的军队，各行其是，谁也指挥不了谁。后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过一次会，冯玉祥态度好些，说把俄国顾问送回俄国去算了。上海杨树浦、两广、江浙杀了不少中共党员。湖南"马日"事变起，取消农民协会，大杀中共党员，武汉内部亦有问题了，因为内部本来就有左右派之分。我的第四军内部亦分开了，分为三支，我自己一部分，陈铭枢和蔡廷锴到福建一部分，张发奎一部分。当时武汉内部动摇，唐生智亦不可靠，中共似乎提出成立十万农民军，汪精卫不赞成，不久，汪精卫亦与中共分裂，汪亦清党，并到南京与蒋介石合作去了。汪精卫到了南京觉得在南京无权，离开南京跑到广东，在广东反对南京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张发奎军队内部亦清党，叶挺、贺龙都是发奎部下，跑到南昌，举行"八一"起义去了，失败后，叶、贺军队转入潮汕一带。叶剑英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却跟张发奎、黄琪翔回广州。汪精卫找我反对南京，但我的军队陈济棠、钱大钧派到潮汕去打叶挺、贺龙去了，而蔡廷锴的军队又在福建。那时我是不主张反对南京的。

这时，南京发生变化，孙传芳由山东反攻，前线失利。原来武汉方面派张发奎为右翼，唐生智为左翼预备夹攻南京的，南京的军队本来出发到徐州，主力在白崇禧手上，白崇禧势力在安徽，是南京的支持者，因为南京两面受攻，蒋介

石指挥的军队退却了。蒋要白崇禧分两路出击，白却主张与唐生智妥协，以专对孙传芳。唐生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本身没有力量，毫无办法，只好下野跑到日本去。我本来不赞成蒋介石下野的，后来派刘栽甫叫蒋回来，当时刘栽甫是广东民政厅长。

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自日本回来，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我亦参加了，因为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失败了，两人又勾结起来，我离开广东以后，就发生了广州事变，而黄琪翔在广州将政权夺了过来。

广州事变时，黄绍竑在广州留守。兵很少，黄琪翔在广州兵变。口号是反对清党，反对南京的特别委员会，不是反对我，这是我在船中得到的电报。南昌“八一”起义以后，叶挺、贺龙的军队在潮汕几乎被消灭了，朱德的军队则折回江西，黄琪翔在事变后，分兵出击东江、西江和南路，广州内部空虚，叶剑英在广州起义，成立苏维埃。李福林在广州河南出兵打叶剑英，叶剑英又失败了。后来，我调陈铭枢、钱大钧、蔡廷锴军队从东江回广州，徐景唐从西江打回广州来，黄琪翔不能在广州立足，从东江向西江走，因为汪蒋合作，蒋介石要黄琪翔去南京，又收容了黄琪翔的兵，蒋介石一向就是利用别人内部自相残杀的。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在东江截住打黄琪翔。在东江老隆一带打得非常激烈，许志锐是黄琪翔的师长在是役阵亡。张发奎带着剩下的两千人，跑到江西，以后跑到徐州，成立了一个师。

（七）一九二九年被扣留在汤山

在上海党务会议开后，汪精卫未得势，蒋介石一方面调动

军队，一方面叫杜月笙暗杀汪精卫。汪出国、胡汉民回国，蒋介石就是这样利用汪赶胡，又利用胡赶汪的，他们两人都受蒋的利用。

第二次北伐，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的力量。我的军队只有钱大钧一部分参加。民国十七年到北京，蒋、阎、冯等在北京开会，我主张在北平建都，南京是朝金粉六之地，亡国之都，是享乐之地。且接近上海，蒋为自己打算，在南京建都。

一九二八年，蒋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各路军队要缩编。这时，蒋介石已与李、白两人有隙，因为清党后，他们要蒋介石下野一次，再则，李、白势力大，李宗仁在武汉，白崇禧在北平，我在广东，被人称为桂系，其实我与桂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时，政治分会的权力很大，广州有分会，武汉有分会，北京亦有分会(注一)，三个地方都是所谓桂系掌握的。蒋介石曾叹气对我说，他的权力，只及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省。我对他说："你能搞好这五省就算不错了。"编遣会议时，冯玉祥军队最多，而地盘最少，只有陕西、河南、山东各省，所以要求增加军饷，蒋介石要裁别人的兵，自己的兵又不肯裁。我对蒋介石说，你是总司令，军队都是你的军队，不必自己争兵多。编遣结果，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我的军队是第八路，不属于集团军。

裁军结果，种下不好之因。编遣会议开得很不好，因为各地有政治会议分会，有很大权力，蒋介石又怕别人有兵占地方，又怕地方反对蒋介石独裁。我回到广东后，在报纸上看见蒋介石到处去阅兵，看情形，蒋介石是向别人示威。那

时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主席，我是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蒋介石打电报要我去南京，我回了一个电报骂蒋介石，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休息建设，然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周围阅兵，是示威之意。如此做法，我不但不去南京，连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都要辞去，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蒋介石又来一个电报说，并无此意，只是想请你来南京谈一下。

不久，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免职，又免了一个师长的职，我在广州打电报骂李宗仁，说他不应如此做法，李宗仁来电报说，是蒋介石要来搞他，蒋收买鲁涤平，偷运枪械和金钱接济鲁涤平，蒋介石勾结李宗仁部下，为李发觉，将东西没收了，故发生此次事件云云。这是由于蒋介石听信广东高州杨永泰的削藩论，故在动手搞湖北之时先收买湖南军队。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大怒，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上，说要讨伐李宗仁，我作为调停人到了上海。李宗仁劝我勿去南京，我看看当时情形不佳，心中犹疑，蒋介石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找我，并作保证，说是南京开会查办武汉事件，说武汉政治分会违犯法度，叫我去做调停人，并叫我去查办。实在我与武汉没有什么关系的，既有蔡元培等四人保证，我问心无他，不但不反蒋，而且反对别人与蒋生事，为避免打内战我决心入南京。

到南京开会时，刘文岛报告说，李宗仁在武汉如何如何，要下令讨伐，说要取消政治分会，我起来反对讨伐，会场空气非常紧张，不久，蒋介石在夜间十一时，派人来缴枪，把我扣留在汤山，这也是蒋介石实行杨永泰的削藩论。

我在广东时，广东治安是比较好的，当时陈铭枢第十一军在南路，陈济棠第四军在西江，徐景唐的第五军在东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